

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编

贵州文史资料选粹



经济社会篇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卷之五

青島市志

卷之五

贵州文史资料选粹

经济社会篇

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贵州文史资料选粹. 经济社会篇/贵州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编. —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09. 8
ISBN 978-7-221-08601-3

I. 贵... II. 贵... III. ①文史资料—贵州省②地区经济—经济发展—贵州省—文集③社会发展—贵州省—文集
IV. K29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13827 号

贵州文史资料选粹 经济社会篇

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编

出版发行	贵州人民出版社
地 址	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责任编辑	程亦赤 朱 江
封面设计	熊 锋
印 刷	贵阳经纬印刷厂
规 格	787 × 1092mm 1/16
字 数	680 千字
印 张	40.5
版 次	2009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500

书 号: 978-7-221-08601-3 定 价: 82.00 元

《贵州文史资料选粹》编辑委员会名单

主 任:黄 瑶

副 主 任:吴嘉甫 王录生

委 员:姚钟伍 邓洪泰 蒙秋明 耿晓红 赵 强
程鹏飞 王晓林 张燕平 殷福保 韦启光
赵少伏 唐文元 孙若芹 王恒富 史继忠

主 编:姚钟伍

副 主 编:唐文元

责任编辑:程亦赤 朱 江

编 辑:唐文元 王恒富 史继忠
方家印 王邦妮 刘 丽

目 录

贵州货币流通史话	赵惠民(1)
我所知道的贵州省银行	赖永初(8)
贵州银行业概述	袁树三(16)
民国时期贵州(省)银行的经营管理(节选)	钱存浩(24)
回忆贵州解放初期的银行工作	王昭浦(44)
贵州企业公司概述	杨大士 桂锦洋(53)
抗战时期的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	桂锦洋 金法棣(60)
解放前的贵阳商会	冯程南(67)
我所经营的以诚商行	吴禹丞(78)
记解放前的贵州省商会	冯程南(89)
解放前贵阳市工商行业变化概况	邓庆棠(98)
贵阳市的会馆	李雨孙(106)
艰苦奋斗创新业	
——回忆解放初期的政府工作	杜恩训 陈 军(112)
回忆贵州解放初期的经济工作	何仁仲 史铭林 张开生(121)
忆解放初期的贵阳市城乡联络委员会	温凯廷(145)
民初贵州劝工局创办始末	尹赞卿(150)
抗战时期贵阳市的回民商业	保健行(154)
川黔大道 货畅其流	
——记第一支武装护送商业车队	赵清文(157)
贵州食盐运销的回忆	伍效高(160)
解放前贵州运销川盐概况	吴鲁钦(169)
我所知道的贵州卷烟工业	黄英氏(179)
贵州卷烟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	黄英氏(193)



- 贵阳一中烟厂的经营管理 张嘉德(211)
- 贵州省工商业联合会 供稿
贵州茅台酒史 省政协文史办公室 整理(216)
- 贵州成义茅酒(华茅)纪略 华问渠 口述 王萼华 记录整理(230)
- 征收鸦片特税的内幕 伍效高(235)
- 我贩运“黔土”外销的经过 伍效高(240)
- 我在贵州创办的事业 伍效高(251)
- 回忆刘熙乙经商的历程 刘裕远(262)
- 镇远酱园厂创始人舒万龄 王天觉(271)
- 贵阳同济堂中药店的创办和发展 曾仁昌 汪 凡(279)
- 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 华问渠 遗稿(284)
- 贵阳科达橡胶厂创建名牌的艰苦历程 刘树基(294)
- 忆裕康猪鬃厂的创业与兴衰 杨维新(299)
- 清水江流域的杉木交易 廖耀南 游芝升(302)
- 安顺三刀简史 薛士贤 程国经(322)
- 抗日战争中的南洋华侨青年回国服务团 许志光(325)
- 回顾贵州省的土地改革运动
——兼忆解放初期中共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 阎学增(330)
- 胜利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
——回顾贵州省原镇远专区的土地改革运动
..... 吴 肃 张玉环(345)
- 回忆贵州省粮食统购统销初期工作的情况 何仁仲 王民三(357)
- 回顾贵州解放初期的民政工作 姚修文(367)
- 回忆我省解放初期的工会工作 李明远 周钟瑾(383)
..... 马振武 易舜祥
- 回忆贵州解放初期的公路运输工作 张 云 王玉书 肖维亮(392)
- 我与贵州汽车运输 毛铁桥(403)
- 贵州铁道修建史略(节选) 陆榭山(416)
- 贵州航空史话 方敦信(434)
- 大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始末 汪福清 张汉钟(437)
- 回忆我国第一个飞机发动机制造厂 吴正华(443)
- 记贵州第一个飞机场——清镇机场 罗来安 整理(448)
- 黄平旧州机场修建记 省政协文史办 整理(451)
- 思南塘头机场修建经过 张文正(454)

抗日战争时期内迁桐梓的四十一兵工厂	杨次宏(459)
四十一兵工厂附属桐梓天门河水力发电厂	金武戎 整理(462)
贵州邮电接管、恢复、发展的回顾	白晶五 吴豫彬(466)
贵州解放初期的农林事业	王虎文(471)
贵州解放初期税收工作的回顾	张 萍(480)
回忆贵阳市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	王友智(489)
建国前贵州气象工作的建立及发展	李良骐(498)
贵阳自来水创始纪实	王家珍(501)
万山汞都近代史略述	丹青 尹 毅(506)
回忆我在炉山时的几件事	高国璋(521)
我省在解放初期贯彻执行婚姻法的回忆	叶谷霖(527)
回忆贵州解放初期的民族工作	王林岗 杨汉先 田 峰(537)
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始末	杨通儒 莫 健(548)
贵州省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简况(截至1984年底)	
.....	健 行 群 力 整理(556)
贵州回民教育发展史略	保健行(572)
瑶麓民族小学的今昔	
——记华侨胡文虎兄弟捐资兴办的瑶麓小学	黄长和(577)
解放初期宗教工作回忆片断	武 琦 涂月僧(581)
法国传教士在安龙教区	周健钟(586)
贵阳中华基督教会始末	陈 衡(607)
桑郎土司制度调查	莫 健(614)
反动统治者破坏民族团结的一个历史罪证	
——记剑河《醒碑》的由来	浅 践(622)
20年代黎平侗族地区大灾荒目击记	廖耀南(626)
1945年三都的水灾	王品魁(630)
罗甸疟疾今昔	黄蕊光(632)
震惊全国的地质专家被劫杀事件	卢昌隆 整理(636)
编后记	(639)

贵州货币流通史话

赵惠民

贵州在解放前是一个交通不方便,又较为贫穷的省份。省内不但缺乏现代工业,农业还是停留在自然经济的状态下,商品流转的支付手段,清末以前靠银锭、银块作周转,以后才由银块转而为铸币,而纸币。

货币应由国家统一发行,作为物价支付的手段,既便利国家的金融管理,又便利人民的使用。我国自辛亥改制以来,在长期分裂割据的局势下,货币成了军阀官僚等祸国殃民的工具,尤其在蒋介石集团统治的时期,更加严重。

本文只叙述清末以来至解放前夕止,贵州货币——主要是纸币的流通使用概况,是一篇实际生活回忆,也是一篇说明当时劳动人民因货币混乱受尽压榨的惨痛史。其中不全面的地方很多,希望关心和了解这个问题的人们,加以补充和纠正。

庞鸿书的官银票 贵州开始行使纸币,约在 1907 年(清光绪三十三年),贵州巡抚庞鸿书发行过官银票 20 万两,由贵州官钱局经理发行,票面订明:每张兑换十足票银一两,五张兑换十足票银五两中锭一锭,十张兑换十足票银十两大锭一锭。因为发行额不多,又能按照票面兑换现银,几个较大地方如遵义、安顺、毕节、铜仁、镇远、贵阳,都普遍使用。

贵州辛亥改制后,唐继尧 1912 年侵黔,任贵州都督,此项官银票仍在市面流通。当时政务处长周沆为维持官银票,曾于 1912 年春初,约集贵阳富商借款 27 万两作基金,由政务处给予借据,年息五厘。此项借款到 1915 年张协陆任财政厅长时,以银两折合银元,本息如数还清。庞鸿书发行的官银票,至此时即告结束。自发行至收回销毁,从未贬值。

唐继尧的花票 1912 年(民国元年)唐继尧来黔时,带来云南造半元大洋,与官银票同时并用。当时的财政司长是华之鸿(号延厘,贵州富绅)。1913 年,唐因滇黔军饷不敷,倡议以贵州都督名义,发行黔币 100 万元,仍





由贵州官钱局发行。票纸由贵州文通书局印刷。票面印有双凤和其他花样,一般人叫做“花票”。后面的年月上,盖有一颗小方印,文曰“贵州都督之印”。发行后,指定完粮纳税非用黔币不可,因而黔币在市场上与大洋一样流通。1913年10月唐继尧回滇时,票价已有很大的低落了。

戴戡的抽签票 唐继尧1913年10月回滇后,贵州军务部改为“贵州保安司令部”,刘显世任司令;政务部改为“贵州民政长官公署”,戴戡任民政长。刘、戴二人,均在1913年10月就职。那时黔币的票值,已低至每元只值三角左右。为维持票值起见,每月用抽签方法兑换一次,中签的即可照票面兑取现洋,每一次只兑换几千元。从而票值就时有涨落。

1914年2月间,张协陆就任财政厅长后^①,所有以前的财政司、盐务局等,都并入了财政厅。张协陆一面继续抽签维持黔币价值;一面整顿田粮厘税;一面提议增发黔币200万元,连前发行的100万元,共为300万元,由贵州银行经理发行。发行以后,票值仍是低落,遂多方设法维持:一面加多抽签号码,暗中派人提价收买黔币,或委托大商号收买等等;一面筹集收买准备金,由金库提取现款,买入黔币归还,如金库现款不敷,即向中国银行贵州分行短期借款来收回。这样办了一年多,到了1916年,黔币价值即由三角左右回升到九角以上,稳定下来。

袁祖铭的七日票 1920年,贵州政局发生变化,币质又乱。1922年袁祖铭以“定黔军”名义回黔主政,陈幼苏任贵州银行经理。次年重新发行纸币100万元。行使了七天,值滇军唐继虞(唐继尧之弟)借名护送刘显世回黔主政,二次侵入贵州,袁祖铭退走重庆,即行停止。当黔军已走,滇军未到期间,贵阳地区治安,由和绍孔率领十几个巡防兵维持秩序。时人作了一副讥笑对联:“陈幼苏七日票,和绍孔一打兵。”可以想见当时的混乱景象。所幸这种纸币发行时间很短,在市面流通数目约20余万元,人民受害,尚不十分严重。

唐继虞的尾巴票 唐继虞率滇军二次侵入贵州,控制了贵州政治经济,刘显世不过是个傀儡,军费完全要出在贵州。最简便的筹饷办法,莫过于发行纸币。唐遂迫不及待地把袁祖铭时期遗留的黔币加以利用,美其名曰维持票值,于是在每一张票子后面,粘贴一张附票,盖上一个官章,强令作十足大洋行使。人们喊这种票子为“尾巴票”。唐于侵黔期间,虽用尽方法,强迫人民使用黔币,始终无法维持。加以他的军队是兵匪不分,利用这种纸

^① 1912年,张协陆由北京政府委为贵州国税厅筹备处处长。1913年元月成立筹备处。1914年元月裁撤国税厅筹备处,另成立贵州财政厅,张任厅长。

币,到处惹是生非,造成社会秩序大乱。人民就在这种暗无天日的情况下,挣扎了两年多。

彭汉章宣告黔币停止使用 1925年,滇军回滇,黔军回黔,袁祖铭那时已侵占重庆,派彭汉章入黔主政,当时旧票仍在市面流通。彭汉章庸懦无能,致演成一群小军阀割据的局面:周西成雄踞黔北一带;杨其昌、马明亮、张廷光等霸据黔西各县;其他东南地方,都被军匪盘踞。彭汉章政令不出省门。那年又是天旱,斗米六七元,而且有钱无市,大多数人都吃草根树皮和白泥巴(又名观音土)度日,饿死的人无法统计,也无人过问。彭汉章知道他的政治寿命不长,想出一个搜刮人民现金的办法,发出布告,宣布黔币停止使用。因为唐继虞把贵州搞得乌烟瘴气,一般的富商大户,认为彭汉章来,首先要维持黔币,在彭未来之前,便大买特买黔币囤积。彭汉章认为:与其拿这个利益送几个大户享受,不如一刀两断,停止使用,就可以把大户整垮,自己就可以安心地吸取人民的现金,达到搜刮目的,还可以冠冕堂皇地说是替人民出了一口气。

周西成搞的所谓“香炉红印票” 彭汉章把贵州搞得太不像样。1926年,袁祖铭改命周西成由赤水来省主政。土皇帝的周西成,对所谓中央的一切法令制度,全不理睬,如邮政、电报局、盐务局等等中央直属机关,一概都由他统一接收。他晓得,掌握了金融货币,于反动统治者最为有利,当然不能任中国银行再这样继续下去,于是就采取一系列措施,搞垮该行。

1915年1月11日,中国银行在贵州设立分行^①,由北京中国银行总行领来大洋5万元,纸币400万元。票额分为100元、50元、10元、5元、1元五种。当时贵州交通不便,商业不发达,100元和50券,始终未经发行。1916年,袁世凯称帝,分行就将这两种券,截角作废。贵州分行自成立至撤销之日止,经过十一二年的时间,纸币发行额达二百数十万元,吸收的银两、银元,也达二百数十万元,加上营业利润,准备金超过了发行额。分行以5万元的现金,十多年当中,就增加了四五十倍。其中主要原因有两个:一个是由于兼办贵州省总金库的业务,使现金容易集聚起来;一个是大量开放贷款,获取利润。贵州当时有一样好生意,就是贩卖鸦片烟,可以一本数利。省内外一些投机商家和军阀、政客,向该行大量借款,大买鸦片烟,向省外输

^① 中国银行贵州分行,于1914年筹备,1915年1月11日开行。唐瑞铜(号士行)任第一任行长,旋于六、七月间调重庆行。熊范舆(铁岩)继任,至1920年十冬月,贵州事变遇害。李端棻(子节)继任,1926年病死。蹇先陶(景潜)继任,1928年服毒死。陈征样(寿民)继任,直至1929年该行撤销为止。

出；同时又大买洋货（那时贵州叫做广货）向省内输入。因此，该行的资金就迅速增加起来。经过贵州几次变乱，军阀政客们向该行提取现款，于是现金不断减少，纸币就逐渐贬值了。

周西成有意摧毁该行，把该行代办的总金库业务收归自己办理，所有从前政府提去的款项，一概拒不承认。从此该行在市面流通的纸币，便一天比一天低落，乃至发生挤兑现象。周西成一面出布告来维持；一面把他在赤水制造的“汽车大洋”开始在市面行使；另一面又把中国银行发行的一元券提去10万元，加盖一个红色公章，其形好似香炉，一般就叫“香炉红印票”（有人说，初盖的是一个黑方章，人们又叫为“黑章票”，后来才改为红章的）。每张仍作一元现洋使用。每天由总金库拨出两三千大洋作兑换之用，人民往兑者，只能十元八元兑取，多数的就不能兑现。从而票值更一天比一天低落，每元只能作六七角左右行使。他的赤造大洋成色低，不受市面欢迎，虽然他的“王法难犯”，大家还是不用。

中国银行贵州分行的折扣票 因为周西成倒行逆施，贵州分行挤兑风潮，日趋严重，陷于瘫痪状态。北京总行莫可如何，只好将该行撤销。所有贵州分行的房屋财产，一概折价点交贵州省政府。库存银两、银元，作为收回已发行的纸币基金，按纸币面额四折收回，实际只能作二折六左右行使，不足的一折四，请求贵州政府代追商欠补足。结果，还是官僚资本的商家大占便宜，当时的复德隆、实践社、蔡恒泰等大商户都发了大财。

根据当时在复德隆服务的刘怀卿说，中国银行贵州分行当时的贷款方法是这样的：有力的几家商号，互相勾结，互相保证，大量向该行贴现；甲商号借名欠乙商号款子三千五千，出一张三月两月的期票，乙商号就拿这张期票到该行贴现，由该行先扣利息，到期如不能还钱，甲商号借口请求展期，又由甲乙两家重办手续，再向该行转期。该行再扣利息一次照转。如此川流不息地周转，分行几乎是这几家商号的保险金库。该行只要有利可图，有欠款期票可作保证，尽管明知其中内容，仍旧大放其贷款。

周西成搞垮中国银行贵州分行，还有一个原因。他的赤造大洋，成色不足，市面上一般拒绝使用，只用中国银行纸币。有人把这种情况对他说明，周西成就动火了，便来一个连根拔掉的毒计：规定凡是缴纳公款、完粮纳税，只准收赤造大洋，不准收中国银行纸币。这也是造成该行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中国银行贵州分行垮台之后，收回已发行的纸币办法，经过与商会协商二成兑现，八成给予该行存款单。但是人们都认为多得不如少得，少得不如现得，为求得现款，争去兑取二成，存单在市面上只能作一成多，暗中互相使

用。一般对该行欠款的商家,就大收这种存单,作为实足现款归还该行欠款。因此,该行的现款逐渐不敷兑现,干脆来一个大家赖骗的办法,以“九六公债”作现款兑付。这种公债,是段祺瑞执政时候发行的,沪、汉交易市场,每天仍有牌价;贵州却没有市场,当然人们就不肯接受。到了这个时候,有的人只好以不了了之。可是贵州商家在外省有生意的,仍然适当收购,因为有人愿意搜买这种公债,准备政府有什么需索,就拿它去应付,无非是上下相欺而已。

蒋介石的各种纸币 周西成于1929年与李燊(小炎)在镇宁火并战死。从此以后,经过毛光翔、王家烈主政时期,人们都谈“纸”色变,干脆重用大洋。大洋之中,仍有等级之分。直到1935年,蒋介石“中央军”进入贵州,“中央银行”的“法币”也就跟踪而来。最初的三五年中,因为它可以向外省汇兑,还能照票面行使。到了1940年前后,票值就逐渐跌落起来。中间一个时期还禁用大洋,布告凡有大洋的应持向“中央银行”兑换“法币”。违反这个命令的,视其情节轻重,处以应得的罚金。如有检举揭发者,并给以相应的奖励。这样,就为宪兵、警察、特务等大开敲诈勒索方便之门。可是一般商家大户,尽量囤积货物,购买黄金,各行其是。这批人多恃有力的军政人物做背景,法币政策对他们说来,很少有什么影响;还是找一碗吃一碗的广大劳动人民,受的影响最大。后来,“法币”在市面上的价值,一天不如一天、一时不如一时地在变化。蒋介石政府又玩起魔术来,由“法币”改为“金圆券”,再由“金圆券”改为“银圆券”。最后,纸币价值连手纸都不如。人民就在这样的生活里挣扎了八九年。

纸币闹成这个样子,物价就飞涨起来。有权势的并不感受威胁。他们可以由有关银行换取金条和大洋,从中还可以倒捞一把。至于一般富商巨贾,早就与银行勾勾搭搭,互相利用,消息异常灵通。他们凭借背景,利用金钱,可以购进他人不能购得的实物,囤积居奇;或者买空卖空,谋取暴利。直到后来,一天二十四小时内,谁也不知道纸币要起多大变化。广东街(现在中华北路南段),顿成贵阳市的金融枢纽。物价的决定,纸币的涨落,每时每刻都由广东街商家任意的操纵着。于是自晨至暮,银行跑街先生,投机倒把商人,都时刻奔走于广东街街头。黑羊井、烟筒巷,是大十字街边一个小胡同,一时也变成了纸币、现洋互换的交易市场,叮叮当当之声,不绝于耳。一块大洋,可换纸币数十万元,乃至一二百万元。高利贷也应运而生,放黄金,放大洋,放货物,有的隔日可以获利一倍。更有所谓百人会,一时风起云涌,妇孺老少,趋之若狂。百人会即是由倡首的约集十人,每人再约集十人,每人出一定的会费,按期摇会,得会者付出优厚利息,利上滚利,越到后来接



会的人,得钱越多。首先集聚十亿或百亿元,由倡首者得首会,二会以下则摇骰子,点数大小决定次序。这样一来,先得者,还可以买得黄金、大洋,或购进实物。但是纸币随时贬值,得会的人,越到后来,数目就越多,越不值钱。不知有好多劳动人民成了这样的受骗者。到了解放前夕,右手得来,左手即不能拿出去。有的长吁短叹,有的吞烟、抹喉而自杀。这是蒋介石集团,纸币政策祸国殃民、流毒社会的万恶罪状的部分缩写。

赖永初的银元票 1948年,赖永初当了贵州银行经理,用该行名义,发行过五角银元票10万元。据其自称,这种银元票,有十足基金,要领用者,非用现洋不能兑换。名为维持金融,实际上赖利用这个机会,抢购物资。直到解放前夕,这种纸币,并未收回,也不知道发行了多少。受害者,又不知有若干人!

硬币铸币简况 贵州行使过的硬币铸币,大约是这样:清代用银两,分为“票银”与“杂色片子银”两种。票银成色十足,有五两、十两的“锭子”,有五十两的“大元宝锭”,有云南的十两左右的“牌坊锭”(其形像牌坊);还有一两左右的“滴水珠”和拿票银用火力压平,截成方形小块的“火块”。片子银分“九九”、“九八”、“九七”、“巧水”(含铅的)等成分。

银锭规定十足成色(当然也有不足成色的),银片换银锭,要照成色补水(补足票银成色的意思)。银片是作零星购物之用的。因为成色不同,价值也不同。当时做生意的人,“认银子”是第一件大事。否则就要受假银子的害。清末银元一出,大家就愿用银元。到了1912年,银元就逐渐代替了银两。

银元在贵州,是辛亥革命以后才大量通用的,种类复杂,成色也不一致。主要的约分外国造的和各省造的两种,看成色来分价值的高低,仍操纵在钱商的手里。外国银元,以当时法国在安南(越南)行使的(通过云南输入的)银元为贵,一般称为“搬庄钱”,以其板面上是一个人持取一根棍棒的形状而称呼的。其他如墨西哥的飞鹰洋、日本的太阳洋,市面上就很少有人使用,因为折扣得极大,或者完全不用。省外银元,以民国三年袁头银元最受人欢迎;以云南造半元最为通用,两个半元折合八角行使。此外如湖北造、江西造和“大清银币”的银元,一样受人欢迎;至于广东、四川造的,成色就差了。银元辅币,仍以袁头毫洋为最受人欢迎;其次则湖北造的一角二角银毫也能十足使用;广东银毫,每十二角折合为一元。周西成来到贵阳后,曾一度利用华家造纸厂作为贵州造币厂,造过一批汽车牌银元,数量不多,成色不足,技术更坏,市面上不甚通用,只是昙花一现。

关于辅币:清代用青铜造的制钱,每千文(一文就是一个)为一吊,这是

官造的大钱。同时还有私造的小钱,一般叫做毛钱或毛毛钱两种。既然大小不一致,质量轻重也就不一致。较整齐的大钱,每千文约值九七以上的片子银七八钱左右,如属有毛钱的,价值就逐渐递减。外县和乡间的买卖,除以银两为标准外,又以铜钱为标准。通用银元后,也以银元为标准了。铜钱的使用,一直延到民初几年。1915年前后,开始用当十铜元。这些是各省铸造的,由省外输入,板面各有不同,质料多是紫铜。1924年前后,紫铜当十铜元和青铜的制钱,都比铜的价钱低。如青铜制钱每千大钱约重六七斤,仅换银两七八钱,卖铜则不值二两左右,于是手工铜器商,搜买后,熔化利用;奸商搜来卖给外国人,尤其是日本人,就将这种辅币逐渐搜尽了。以后,就开始使用重庆铜元局造的黄铜当五十文铜元和当二百文铜元。有的地方,五十文铜元不够用,就将二百文铜元截成四块,作四个五十文使用。好在所谓政府既不过问,大家也就各行其是了。

稿内资料,多由徐寿伯先生供给,并由严池华、刘怀卿、蔡森久、肖子有、韩汝燊等先生补充,就此向他们表示感谢。

(选自《贵州文史资料选辑》第2辑)



我所知道的贵州省银行

赖永初

贵州银行于1940年以官商合办的形式组织成立,1947年发还商股,收归官办,改组为贵州省银行;1949年贵州解放后结束。该行成立初期,我是负责筹备人之一;1948年8月到解放前,我任贵州省银行总经理,其中内幕,知道的较多,现在将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实逐一回忆,叙述出来,以供参考。错误之处,希熟悉该行内幕的读者,予以补充纠正,以便史料更臻翔实。

贵州银行的产生及其与贵州企业公司的关系 贵州银行,是适应贵州企业公司的需要而产生的。1938年吴鼎昌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时,企图以官僚资本操纵全省工商业,利用贵阳市长何辑五(贵州兴义人,何应钦的胞弟)的地域和人事关系,拉拢贵阳市一部分商人,以官商合办形式,组织贵州省企业公司,何辑五任董事长,彭湖任总经理。彭是宋子文的亲信、吴鼎昌的代理人,他在吴、何两人的指使下,总揽公司全权,操纵一切;商股部分的董、监事不过备员而已。

贵州企业公司的经营范围,包括工商业,而其重点则以办工厂、开矿为前提。该公司有政权作背景,进行非法经营,大规模地偷税漏税。而当时日货禁止入口,违禁偷运者,即被没收(没收的日货均发交企业公司出售)。但是,该公司则凭借特权,从香港等地大量买进日货(如轮胎、五金器材、日用百货奢侈化妆品等),在市场上销售,获得不少暴利。因此,企业公司成立不久,即收买、开办了不少厂、矿(如贵阳烟厂、水银厂、煤矿、锑矿、伐木公司等,都是该公司较大的企业)。但是资金有限,国家银行虽然可以贷款,而按照规定,巨额资金,须有银行作担保(以吴鼎昌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,本来可以利用职权无限制地向国家银行贷款,但在手续上,总有些不方便),因此,以吴鼎昌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,便积极谋划组织银行,来作为企业公司的周转金库;而这个银行,又必须是官商合办的,方能充分利用。于是,由何辑五出面,因何绍周(何辑五的侄儿)的关系,拉拢了当时

贵阳市的大商人、贵州省临时参议会会议员戴蕴珊(戴与何绍周有经济关系),于1940年夏,在临参会开会期间,书面提案,建议以官商合办形式,组织贵州银行。

提案经议会通过后,咨送政府执行,筹备成立。按官股六成、商股四成的比例,征集股金(股金总额大致是50万元至100万元,具体数字记不清)。商股部分,由孙伯陶(孙是何辑五的忠实走卒)负责征集。贵阳市商人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:凡与官府合股经营任何企业,无论投入资金多少,都是“肉包子打狗,有去无回”,多数不愿投资。孙伯陶奔走了不少时间,征集商股,仍然得不到要领。何辑五看到征集商股事,将成僵局,又授意孙伯陶以威胁、利诱种种方式,向商界进行压迫、说服、拉拢,继又派其心腹走卒徐礼和协助进行,结果戴蕴珊、戴子儒、刘熙乙、邓若符、孙蕴奇、赖永初、伍效高等都参加了银行筹备工作;官股方面派陶玄九(企业公司的副经理)、彭潮(企业公司总经理)加入,组成贵州银行筹备委员会。商股征集足额后,银行即正式成立。

戴蕴珊自命是贵阳市商界的老前辈,又是银行的创始人,满以为总经理一席“非我莫属”,于是他在筹备会议上,强调“官股任董事长,商股任总经理”,以为必然可以得到工商界的支持和政府的同意。詎料选举结果,周贻春当选了董事长(当时任财政厅长),钱景星(吴鼎昌的亲信,企业公司监察,江苏人)为总经理,孙伯陶为协理,戴蕴珊仅得封一个监察(按规定,官商合办的企业,官股部分的负责人由政府指派,商股部分则由股东大会选举。但是所谓选举,不过是形式,实际上银行负责人名单,都是由政府内定的)。揭晓后,戴还不识时务,在临参会喋喋不休,指桑骂槐地说吴鼎昌、何辑五等把持垄断。吴鼎昌知道了(省临参会的秘书长杜协民,是吴鼎昌派来的驻会侦探,及时把戴蕴珊的牢骚话告知了吴鼎昌),即给他记下“一笔账”。1941年春,贵阳市粮价陡涨,戴蕴珊积存田租谷300余担,不拿出来平糶,吴鼎昌即借此题目,给戴加了一个“囤积居奇”的罪名,将其逮捕。戴失自由后,省临参会议长平刚写信与吴鼎昌说情,不料吴置之不理。吴鼎昌对戴蕴珊施此手段的原因,一方面是压服贵阳市工商界,不敢与贵州企业公司竞争;另一方面是给省临参会以有力打击,“杀鸡吓猴儿”,使当时所谓敢于说话的人们,自觉地收敛“风头”,不敢再与政府对抗。吴鼎昌这一着棋果然下准了,自戴蕴珊入狱后,不独贵阳市工商界对贵州银行与贵州企业公司不敢作任何干涉,即省临参会的议员们,也“三缄其口”了。1943年秋,戴蕴珊正在狱中生病,我去找郑道儒(吴鼎昌的秘书长),请其再去说情,吴鼎昌虽然允许戴取保出外就医,但为顾全省临参会的面子,嘱郑转告我,须请